

跨国民族问题与边疆稳定战略研究

□安 俭

〔摘 要〕 研究我国西北、西南跨国民族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变迁,特别是目前我国正处在西部大开发时期,而西部地区正是我国多民族聚居地,我国的民族自治区社会经济体制正可借此时机加以完善,保持边疆稳定,促进中华民族的凝聚与繁荣。

〔关键词〕 跨国民族;西北;西南;边疆稳定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887(2004)01-0096-04

A Research on the Problem of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and the Stability of Border Areas

An Jian

(History Dep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o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icissitudes of the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in Northwest and Southwest China,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realistically important for the stability, the solidity and prosperity of present west frontier of China, where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live, and where is undergoing great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he local governments can take the chance to improve their social economic systems.

Key Words: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northeast; northwest; stability of border areas

在 我国,对跨国民族问题的研究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才兴起的一个民族研究的新领域。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的重要讲话发表以后,中国的陆路边疆地区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拥有众多跨国民族的西北、西南地区则依靠其自身优势,通过边民互市、边境贸易、文化交流和探亲访友等形式不断加强着中国同周边国家之间的联系,架起了一座国与国之间友好往来的桥梁。但是,在发展周边关系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如利用边贸的渠道贩运毒品、拐卖人口等违法犯罪问题也相继出现,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在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浪潮影响下,美国等西方势力也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干涉包括中国在内的他国内政,使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也成为影响中国边疆地区社会稳定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跨国民族问题研究,对中国来说,不仅具有推动民族学等学科深入发展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跨国民族问题的主要类型

跨国民族的内涵一般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相对于

原同一民族的主体民族国家而言的跨居其他国家的分支和少数民族;其二是指相对于原同一民族起源地的母国母语而言的他国分支;其三是既未建立主体民族国家,又不存在母国母族而分居于不同国度的各跨国民族。民族现象是复杂的社会存在,也有上述几种情况错综存在的跨国民族,而且不同时期,原来的组织会因为国家存亡等等原因而发生转化。而跨国民族问题则一般是指跨国民族的分支产生的矛盾冲突,不过也往往受主体民族与母族政策、文化与民族心理素质影响。我们是想通过对跨国民族问题的主要类型的分析,来揭示跨国民族问题是现代社会一种新生态的世界性民族问题,指出它在国际关系中已是影响地区以至世界稳定、主权国家安危、相关民族兴亡的重要因素,从而呼吁国际社会及民族国家对跨国民族问题予以充分重视与广泛研究。跨国民族问题的主要类型大致可分为三种典型的类型:

1. 发展中国家类型

民族统一、独立运动而引发冲突的跨国民族问题。如非洲处于独立运动中的国家反对殖民主义时期遗留的不合理疆域划分而要求合并跨国同族的领土、建立民族国家的争战。因为非洲国家几何图形的边界划分,就是西方殖民

主义势力分割非洲大陆的结果,它将许多属于同一部落、部族的人民划分在不同的国家之中,由此产生了频繁的领土争夺和民族仇杀的地缘冲突,像索马里争战、喀麦隆与尼日利亚流血冲突等等,已使数百万人口丧生。又如库尔德人问题。库尔德人是生活在西亚库尔德斯坦地区的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也是西亚地区除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伊朗人)这三个主要民族之外,人口最多的民族——大约共有2000万,主要分布在土耳其南部、伊拉克北部和伊朗西北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斯曼帝国解体后,1920年签订的《色佛条约》中,已明确规定同意库尔德人独立,但是1923年7月签订的《洛桑条约》废除了《色佛条约》,库尔德斯坦独立的设想遂成为泡影。而且根据《洛桑条约》,库尔德斯坦被协约国划分给了四邻国家(今天这样的局面即由此而来)。从此库尔德跨国民族问题便成了西亚地缘冲突的乱源,造成几十年来一国支持另一国的库尔德人不断发生动乱的局面。就连才结束不久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也是利用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问题,公开支持库尔德人在战场上对付伊拉克正规军,从而引起拥有库尔德跨国民族的土耳其官方政府的不满,使西亚的库尔德人问题再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这类跨国民族,不论是要求各自独立或是合并建立独立国家,都反映出他们政治文化观念上的变异。

2. 原社会主义国家类型

一些多民族国家中的跨国民族地缘冲突和离心倾向引发的动乱。如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和科索沃危机等。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是近十几年来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冲突的焦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简称纳—卡州)是阿塞拜疆境内的一个自治州,面积4400平方公里,人口17.7万,其中亚美尼亚约占3/4。该州在地理上并没有与亚美尼亚共和国连接,周围地区都是阿塞拜疆人民住地,因此亚美尼亚人是跨居于阿塞拜疆的跨国民族亚美尼亚族分支。两国为了这一地区争战多年,直到1998年冲突才暂告平息。亚美尼亚甚至派出军队,支持同源跨国民族但最终仍未夺得纳—卡地区,却使这一地区周边成了一片废墟,50万难民逃离家园。^{[1](P69)}科索沃危机是阿尔巴尼亚支持其跨居南联盟科索沃地区同族独立而爆发的危机。这一危机引发的直接后果是爆发了一场由多国部队参加的地区局部战争,战争的结果使南联盟的国名不久后更改,经济倒退约十年,经济损失高达两千多亿美元,近百万难民流离失所,而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也未获独立,更不可能并入阿尔巴尼亚国,最终却落了个科索沃领土由国际维和部队共管的局面。另外,乌兹别克与梅赫赫土耳其人的冲突,克里米亚鞑靼人、日尔曼人要求回归故土等离心倾向的示威、动乱,虽并不激烈,却引发了震惊世界的苏联与东欧巨变。由此可见,跨国民族问题已成了世界的现代灾难。上述这类跨国民族问题滋生出的与国际和平民主的主流和真正的本民族利益并不相符的狭隘民族主义、民族分立主义,也侵犯了国际社会认同的主权国家的利益。

3. 资本主义国家类型

追求政治权力,以跨国民族分立主义为特征的动乱而引发的跨国民族问题。如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人问题、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等。

(1) 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是西欧的一个典型的跨国民族问题。北爱尔兰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一部分,面积1.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多万。其中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有50万,其余为信奉基督新教的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的移民后裔。几百年来,这两个民族归属不同、文化传统相异和宗教信仰有别的民族经常发生冲突,至今未妥善解决。北爱尔兰跨国民族问题不仅关系到当地的局势,而且也影响着英国的政治稳定和英国与爱尔兰的关系,甚至对西欧政治局势的稳定也产生潜在的影响,因而北爱尔兰人的跨国民族问题在国际上一直引人注目。

北爱尔兰问题从表面上看似是宗教问题,其实质上是典型的跨国民族问题,信仰不同所产生的宗教矛盾,掩盖了深刻的民族矛盾。几十年来,北爱尔兰执政党推行了一套压迫和歧视爱尔兰人的政策,实质上是几百年来英国对爱尔兰所推行的殖民政策的继续。特别是爱尔兰独立后,生活在英国北爱尔兰的爱尔兰人仍处于受歧视的地位,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平等,促使他们要脱离英国,与爱尔兰共和国合并,建立统一的爱尔兰共和国。这种跨国民族问题的加剧,直接导致了英、爱两国矛盾的加深,使之成为世界瞩目的问题。

(2) 西班牙巴斯克人的跨国民族问题,不是经济相对落后的问题,而是经济发展起来,富裕后更尖锐的问题。巴斯克人居住的比斯开、吉普斯夸、阿拉瓦和纳瓦拉四省,集中了西班牙大部分工业财富,是较早实现工业化的地区,在西班牙的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这一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也高于国内其他地区。巴斯克的资产阶级认为,生活富裕是他们工作勤奋的结果,对国内其他地区常常以施舍者自居。经济条件的优越,在政治上就开始追求权力。由于受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驱使,巴斯克人总想从西班牙分离出去,这对西班牙政府来讲,当然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起,政府采取较温和的政策,实行民族政治和地方政治相结合的“自治制度”。然而,激进的巴斯克人极力反对政府的“自治制度”,采用示威游行、全面罢工到进行爆炸、暗杀等恐怖手段,要求建立包括西班牙的四个巴斯克省和法国的三个巴斯克省在内的“巴斯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仅1979年,“巴斯克民族与自由(ETA)”组织就制造了195起杀人事件,恐怖活动时常发生。1997年,“巴斯克独立联盟”绑架残杀一位著名青年政治家,对此,连巴斯克本族人也表示谴责。这种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发展到恐怖主义活动,不仅给社会制造动荡,而且也危害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从而使这项运动走向反动,遭到国际社会舆论的普遍谴责。

(3) 加拿大魁北克法裔问题,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保障魁北克文化安全”的口号开始,其地方政府的法兰

西化政策日益凸现。1967年,勒内勒维克提出了魁北克从加拿大分立的“两国一制”论。同年,法国戴高乐总统发表“自由魁北克万岁”的讲话,表示支持。尽管魁北克解放阵线制造恐怖事件遭到加拿大舆论的纷纷指责,认为这种狭隘民族主义是“背离人类文明的倒退概念”,但从20世纪80年代魁北克公民投票尚有64%的人反对分立,而到1995年却只差一个百分点的情况看,其民族分立主义势力仍呈扩展势头。^[2]这类跨国民族问题类型与英国、西班牙的相比,较为特殊,虽在闹独立,但有时并未受到国外同族的支持,因此,严格地说,它是属于国内民族集团利益驱使而造成的分立主义色彩的政治文化变异。

二、西部大开发中的跨国民族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共有55个少数民族,他们的绝大多数主要分布在祖国的西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开发,不仅是贯彻落实“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步骤,而且也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课题。目前,我国建立有民族自治地方154个,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和119个自治县,占全国总面积的64%。另外,作为自治地方的补充形式,全国还有1200多个民族乡。民族地区处于我国大地势的一、二级台阶,从三面环抱神州大地,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民族地区又是江河之源,大江大河从这里奔流东下,哺育出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我国众多的资源,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主要分布在民族地区。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看,55个少数民族人口的绝对数并不小,已达1亿零643万,占全国总人口的8.41%。这充分说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位置。

我国西部主要是少数民族分布的地区,少数民族又主要聚居在西部。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5个是民族自治区,3个是按自治区对待的多民族省(云南、贵州、青海),四川有3州3县、甘肃有2州7县是民族自治地方,重庆有4个自治县。现在,西部90%以上的面积、95%以上的县,以及全国少数民族将近80%的人口,都已纳入西部大开发的范围,或者可以享受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但是,就目前从西部大开发的形势看,讲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多,讲加快少数民族发展的少。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学术上进行研究,切实为西部大开发服务。

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有一半以上是跨国民族,且主要分布在西北和西南地区。西北的跨国民族主要有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汉族和回族。他们主要聚居在中国与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等国边界线相连或不相连的地区。而西南的跨国民族在我国最多,总共不下二十个。其中跨居中越两国的有京族、壮族、布依族、仫佬族、彝族、哈尼族;跨居中缅两国的有独龙族、傈僳族、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怒族、傣族等;跨居中印两

国的有珞巴族、门巴族;同时跨居中越、中老的有苗族、瑶族、佤族;跨居中缅、中老的有拉祜族;跨居中缅、中印的有景颇族;另外,跨居越南、缅甸、老挝等国的有汉族;跨居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克什米尔等多国和地区的有藏族。^①

我国的跨国民族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地区,这主要与我国古代民族迁徙的流向及西北、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西北与西南,作为汉文化的边远地带,其文化的影响力与中原王朝的控制力都相对弱小,这为众多少数民族聚居此地并得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提供了条件。从地理角度分析,西北地接中亚,自古扼丝路通衢要津,擅中西商贸巨利,故而历来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势在必得的迤南福地;又因没有一个强大到足以制御其他一切民族的势力存在,均势结果最终导致众多民族相安共处的格局。西南地处僻远,山峻水险,这为南方众多弱小民族栖身自保布下了天然屏障。

跨国民族是连接国与国之间的桥梁,地处我国西部大开发的西部地区,又是跨国民族较为集中的地区。对跨国民族的研究,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有利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的实施。因为,我国跨国民族聚居地区目前经济还较为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与内地沿海地区相比,经济发展的差距较大。所以,要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就要对跨国民族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发展等诸方面进行横向比较研究,发挥其自身优势,借西部大开发之势,发展边境贸易,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而西北民族地区,过去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现在又是欧亚大陆的中心。就我国的新疆和中亚而言,自古就被称作“世界的十字路口”。我国的陆界线长达22000公里,比海岸线还长4000公里,陆上邻国15个,再加上不相邻的国家,我国西北的对外开放,或者讲我国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舞台。而我国西北的跨国民族在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交往中,西南诸跨国民族对东南亚国家的开放和合作中,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如果能够再次振兴陆上交通,使我国向西开放活起来,形成与沿海开放互为呼应,相互匹配之势,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就可以更主动。它所发挥的作用,产生的影响,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总之,古今中外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是否实行对外开放,以及对外开放的程度,是国家治乱和国力盛衰的标志。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研究跨国民族问题,是促进边疆地区自力更生、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更好地请进来、走出去,利于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来加快自身发展的正确途径。我们

^① 柯尔克孜族国外叫吉尔吉斯族,乌孜别克族国外叫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国外叫鞑靼族,回族中亚叫东干人,京族在越南叫越族,壮族在越南有相对应的岱族、侬族,彝族则叫保保族,傈僳族在缅甸叫保保族,德昂族叫独龙族,傣族叫泰族、掸族,拉祜族在缅甸、老挝叫么舍、么瑟等。

一定要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全局出发,制定和完善政策措施,把跨国民族地区的自身优势进一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这对加快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少数民族的整体素质,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巩固国防,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跨国民族与国家安全体系构建

跨国民族是一个兼有文化与政治内涵的特殊族体。由于其特殊性,跨国民族往往会在国家体制、意识形态、文化传统、文明属性、政策取向、经济发展等各方面存在差异,有差异就不免会有矛盾,因此跨国民族也就存在容易被某种集团势力利用,使其民族感情、同族观念可能超越其爱国感情、国家观念的特殊性。这也正是跨国民族问题较一般民族问题更为复杂的原因。它要求除了协调国内族际关系外,还要妥善处理国际关系,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地缘关系以及不同属性文明间的关系,建立一种国际地缘综合安全体系。

以前一般国家大多依靠军事实力驻军守边来防止民族问题。而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连美国国际问题智囊团也以提出应以经济手段代替军事手段来维和其“世界领导地位”的战略思想。这标志着当代已进入了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进入了各国为增强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而激烈竞争的时代。正如江泽民指出的:“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3]综合国力与经济实力不仅成为衡量主权国家在国际新格局中所占地位的筹码,并日益成为处理一切国际关系的主导因素。在这场无硝烟的国际经济战争中,胜负成败,影响深远,又由于种种国际法则的作用,一般会使强者更强,弱者愈弱,后果严重。因此,国际社会纷纷采取了地缘政治经济战略,作为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和最大限度地分享全球化利益的战略手段。今天各国政治的、经济的、安全防御的地缘联合体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与此相关的各种综合安全保障和全球战略的理论,在西方更是五彩缤纷。根据当前的国际关系与我国的实际,我们主张首先以亚太经合组织和上海六国组织为重点对象,实施一种“双翼结构”式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以保障和平建设的友好外部环境。

亚太经合组织与中国西部,虽然在地缘上不像上海六国组织那样,成片毗邻,但其政治经济地位与作用,无论对整个中国,还是中国西部都是最重要的。不仅中、美、日之间的关系与中国构筑综合安全体系密切相关,而且中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经济往来主要集中在亚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利益系于亚太”。^[4]^(P200)在政治上我们将亚太经合组织当做保障中国和平建设环境而进行“讲台外交”的舞台,在经济上力争与亚太各国成为互赢合作的“经贸伙伴”,在文化上则作为与美国、澳大利亚、新

加坡、菲律宾等亚太华裔儿女维系同胞情缘的“文化纽带”,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上海六国合作组织,由于各成员国间相互地域毗邻,加之还有过去同为“兄弟”的基础,其作为战略合作伙伴间的多功能地缘联合体的前景是极其乐观的。尽管目前它只是一个地缘安全体系模式,但它的作用可不能小视。我们希望这个与中国西部直接毗邻的地缘板块,能通过共同努力,发展成为进行政治、经济、安全等全面平等互助合作,并对世界具有“示范意义”的新型地缘合作组织。我们主张,其政治内涵,应从现在反对“分立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方面起步,扩大到能引导民族主义浪潮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特别是在建立国际地缘综合安全体系中,我们应充分重视发挥跨国民族同源文化与民族感情的积极纽带作用,促进跨国民族的和平跨居。其中超越国家关系而径直交往是最值得提倡和发展的。如中越关系虽经历过风风雨雨,但跨居中越的民族却始终未停止往来。我国历次政治运动时和1958~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上万壮族到越南投靠亲友;而1970~1989年越南经济危机时,则越南普拉族自发大批迁到云南的同族亲友处。两国间估计有上千条大路小径相通,即使两侧在布满地雷时,他们也沿自己踩出的小径来往。而支持这种割不断的跨国交往的原因,我们以为主要是小文化传统,即民间的习俗传统。如越南的傩傩族人死后,亲友要敲打铜鼓把亡灵送回死者在中国的故乡。又如两国人常到边境两侧赶“圩市”进行交易等等。^[5]可以说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不受国家关系影响的民间主导型和平跨居模式,若将其作为和平跨居、文明共存的较佳模式推广,地缘和平就会有保障。

总之,中华民族的振兴,还要走过曲折多变和参与国际实力竞争的漫漫征途。在这条不平坦的道路上,更不应忘记,凭实力才能进入多极世界之“局”,本国的“民富边安”更是关系重大的“重中之重”,这是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牢记的座右铭。■

参考文献

- [1] 陈志良,黄明哲.世界新纪元丛书·全球大视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 [2] 王智娟.当代民族冲突透视[J].中亚研究,1997,(3).
- [3]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1-07-02.
- [4] 宫占奎,等.区域经济组织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 [5] 范宏贵.中越两国的跨境民族概述[J].民族研究,1999,(6).

收稿日期 2003-11-01

[责任编辑 黄世杰]

[责任校对 周耀明]

[作者简介] 安俭(1960~),男,甘肃陇西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上海,邮编:200062。